

社會與思想叢書

WAPL882900-4



革命 · 歷史 · 小說

黃子平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革命 · 歷史 · 小說

黃子平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革命 歷史 小說
黃子平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 19 590077 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革命」的經典化與再浪漫化	7
一	經典化與「重大題材」	
二	「應寫」、「可寫」與「不可寫」	
三	「怎麼寫」	
四	再浪漫化	
第二章	「革命歷史小說」：時間與敘述	21
一	進化史觀	
二	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	人物關係的時間化	
四	革命的循環	
五	時間觀的改變	
第三章	革命·性·長篇小說	35
一	話語空間的切割、劃分與連接	
二	政治/言情、英雄/男女	
三	在「社會全景」中寫「性」說「慾」	
四	「客觀冷靜」的敘述	
五	革命敘事的「聖潔化」	

第四章	革命·土匪·英雄傳奇	59
一	黑話/紅話	
二	誨盜/誨道	
三	「思想革命」/「政治革命」	
四	「搶一個共產黨領路向前」	
五	反出江湖	
六	英雄傳奇	
第五章	「革命歷史小說」中的宗教修辭	73
一	「空白」與「宗教修辭」	
二	空間：道觀佛堂和聖地	
三	身體：脫胎換骨	
四	苦難：報仇報冤和報恩	
五	「革命」和「歷史神話」	
第六章	小說與新聞：「真實」向話語的轉換	91
一	分分合合	
二	「壓抑機制」說	
三	真實/知識/權力	
四	〈我該怎麼辦？〉	
五	〈大陸人〉	
六	在「真實」的「大觀園」裡	
第七章	《故事新編》：時間與敘述	107
一	「故事新編」與「朝花夕拾」	
二	「敘事時間」和「所敘時間」	
三	敘述以反抗「絕望」	

四	放在「引號」中的敘述	
五	「油滑」：從消極到積極	
六	故事新讀	
第八章	命運三重奏 《家》與「家」與「家中人」	131
一	「脫離枯樹的綠葉」	
二	青春、愛情和自由	
三	從《家》到《家變》	
第九章	病的隱喻和文學生產	141
一	「棄醫從文」的故事	
二	醫院中新來的青年人	
三	「還是雜文時代」？	
四	大喝一聲：「你有病呀！」	
第十章	灰蘭中的敘述	159
一	「如果」	
二	「瑪麗個案」	
三	敘述者「馬壽郎」	
四	何往而非「灰蘭」？	
五	短文長註	
後記		171
參考書目		173

前言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末，橫跨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個案中最宏大、最複雜的社會變動。從19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這段時間的中國革命包含了政治學理論中所有類型的「革命」——千禧年式的農民叛亂（太平天國），無政府式的暴動（義和拳），政變（西安事變和林彪事件），軍事叛變（北洋軍閥時期），國共內戰（1945-49），自上而下發動的全國性動亂（文化大革命）。其中同時伴隨着極其複雜的意識形態競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孫文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這種競爭至今仍在臺灣海峽兩岸以及海外許多華人社區以各種不同形式持續着。

本書不打算研究這些革命，而只是研究對這些革命的「講述」。更具體地說，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以「小說」形式對這些歷史變動所作的敘述。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一方面，「小說」被捲入革命之中，擔負起「新一國之民」（梁啟超）或「改造國民性」（魯迅）的重任；另一方面，「小說形式」本身也在這漫長的一個世紀裡發生着不容忽視的「革命」。革命深刻地改變了我們想像、虛構和敘述歷史與現實的方式。「小說」有時直接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份（「齒輪和螺絲釘」、「旗幟和炸彈」），有時，卻於邊緣處記下了正統「大歷史」必定遺漏的苦難、掙扎與悲歡。文本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建立、維護與顛覆，同樣成為本世紀中國歷史最令人眩惑的奇觀。因此，文學形式與革命、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本書想一再加以探討的課題。其中，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的「言情小說」與「英雄傳奇」兩種樣式，以及歐俄傳入的「寫實主義」

長篇小說樣式，在這種互動中的衍變最為耐人尋味。

「革命歷史小說」是我對中國大陸五十至七十年代生產的一大批作品的「文學史」命名。這些作品在既定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它們承擔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典化的功能，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維繫當代國人的大希望與大恐懼，證明當代現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範圍內的講述與閱讀實踐，建構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這些作品的印數極大，而且通常都被迅速改編為電影、話劇、舞劇、歌劇、戲曲、連環圖畫，乃至進入中小學語文課本。人物形象、情節、對白臺詞無不家喻戶曉，深入日常語言之中。對「革命歷史」的虛構敘述儼然形成了一套瀰漫性基奠性的「話語」，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類的敘述方式變得非法或不可能。然而，正如我在本書中討論到的，此類作品本身也仍然包含着無法消泯的異質性，使得「經典化」也成為永遠需要繼續「進行到底」的無盡過程。持續不斷的清洗、修改、增飾，恰恰反證了講述和閱讀「革命歷史」的另類可能性的（潛）存在。

本書的主要部份即在於試圖重新解讀這批「革命歷史小說」。解讀意味着不再把這些文本視為單純信奉的「經典」，而是回到歷史深處去揭示它們的生產機制和意義架構，去暴露現存文本中被遺忘、被遮掩、被涂飾的歷史多元複雜性。如果歷史不僅僅意味着已經消逝的「過去」，也意味着經由講述而呈現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現在」，解讀便具有釋放我們對當前的關切、對未來的焦慮的功能。因此，本書不想為讀者提供又一種固化了的文本意義，卻亟願意展示作者——作為基本上由「革命歷史小說」滋養了因而也拘限了其閱讀想像力的一代人中的一員——尋求新的解讀可能性的艱難過程。

當代敘述影響我們想像世界的方式之至鉅者，莫過於「時間觀」一項。傳統治亂交替的「循環史觀」被樂觀向上的進化論矢線所取代。「革命歷史小說」遵循「從失敗走向勝利，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模式來構思情節，並依照各階級在時間矢線上的「前進」程度來安排人物關係。但是，一旦革命被神聖化，被理解為歷史的常態，魯迅所說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惡性循環就無法避免了。其中最為反諷的正是，革命的現實發展對「革命歷史小說」本身的虐殺。於是，當代小說敘述的危機正在於：如何重新賦予「時間」以意義，如何重新組織可以理解的歷史情節，如何在一個被無數次大小「革命」摧毀的混亂時空中講故事？

中國革命中，人們身體的形變以其最鮮明的視像激動文學的敘述，從剪辮子的故事、放小腳的故事到看殺頭的故事，已有眾多的研究者討論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的這些「肉體凝視」。革命是用暴力改變社會體系的社會行為，革命也改變了人們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翻身」），革命也可能改變了人們談論和閱讀自己身體的方式。其中，「性」並非身體的全部，卻彷彿成為隱藏在身體內部深處的、某種神祕的和本源性的東西，成為「科學」探測的領域，成為「革命」所要解放或壓抑或犧牲的能量。本書以茅盾的長篇寫作為例，討論在小說中同時講述「革命」和「性」的敘述策略，如何折射了在本世紀的天翻地覆中安「身」立命的悲劇性掙扎。

在「革命歷史小說」中，《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等書名深刻地顯示了當代敘述與傳統「英雄傳奇」的內在聯繫。農民革命的先天不足與「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理想超前，這一帶有根本性質的內在矛盾的想像性解決，逐漸形成了一個百講不厭的「草莽英雄」的思想成長故事模式。本書討論

了從「誨盜」到「誨（革命）道」的敘述轉變，意識形態對綠林傳奇的收編與招安，以及「英雄好漢烏龜王八蛋」最終重新「反出江湖」的文學史歷程。

從東漢末年的「青天已死，黃天當立」，到當代拉美的「解放神學」，革命與宗教的關係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論題。本書討論的卻是一個以無神論唯物論為官定哲學基礎的小說創作中，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宗教修辭」。並無足夠資料證明「革命歷史小說」的作者們對佛道耶諸教有何最基本的認識，然而作品中道觀佛堂以及聖地的空間運用，脫胎換骨的身、心、靈隱喻，乃至苦難的贖與救，信仰的罪與罰，在在都顯示了宗教無意識或「民間信仰文化」在當代敘述中的頑強功用。探討「革命歷史小說」中的宗教修辭，便是從敘述的層面，來考察當代意識形態與傳統信仰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如何借助宗教的「神/魔」「正/邪」得到表達，從而創造了在民眾中閱讀與理解的條件。但更細微之處，卻在敘事時空的安排處理，人物救贖的歷練設計，人間苦難的政治解決等等，鋪展出對「歷史」「命運」、「人生」、「死亡」等等的一整套講述規範。

「歷史小說」內蘊的悖論始終是「虛構/紀實」的混淆。本書卻藉討論兩個「小說/新聞」相互轉化的有趣個案，來探詢講述「真實」的諸般社會文化條件。與通常認為革命意識形態「壓抑」真相的觀點不同，本書認為情形要複雜得多。權力並不迴避「真實」，恰恰相反，它力圖收集和控制「全部」真實（「向黨交心」、「坦白從寬」等等），然後加以分配、流通、消費和再生產。於是，權力在這個過程中，反諷地，全神貫注地傾聽了「真實」的同時也儲存了它們、積累了它們、壟斷了它們；在把它們推向邊緣的同時也無意中擴散了它們。當

代敘述的祕密不在於憑藉彌天大謊瞞天過海，而在於界定「真實」的標準，分配享受「真實」的等級差序。但是，「真實」也就在這時四分五裂了。把握一個「整體」的「真實」便成為一個激發烏托邦衝動的解放目標。

魯迅是第一個以「不嚴肅」的方式講述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小說家（〈阿Q正傳〉、〈風波〉等），以其悲喜劇的穿透力洞察了正史所竭力「遺忘」的一切。本書討論的卻是他的《故事新編》，一部獨特的短篇歷史小說集。魯迅提供了一種重寫歷史的「油滑」策略：古今雜陳，混淆史傳與小說與雜文的界線，將滑稽與深刻無以倫比地結合起來，用對古人「不誠敬」的方式使之活潑，將擷自典籍與當代媒介的材料並置於小說之中，打上引號並加以推敲和嘲諷。「歷史」在這裡不是頂禮膜拜的一則神話，也不是以當代意識形態強加新解的僵死的故紙，而是被觸發來與當代讀者對話的活的「記憶」。在一個「不會笑」的當代政治環境中，這種「油滑」敘述策略當然是「革命歷史小說」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後，我們才能讀到對「革命歷史」的「不嚴肅」書寫。

另一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作家巴金，他的創作與「革命」的關係是最為奇特弔詭的。一方面，他的小說如此熱情地揭露黑暗、控訴不義、謳歌革命，啟發了三十至四十年代大批中國青年投奔革命；另一方面，他本人卻被一直排拒於革命的主流之外，乃至其作品反過來成為革命鞭撻的對象。本書討論了巴金最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引發對「青年」、「愛」、「自由」等價值口號，在文學與意識形態諸層面種種復雜運作的考察。「革命歷史小說」其實承續了巴金浪漫激越的「激情通俗劇」（melodrama）的寫作傳統，營造的是一個高潮迭起的小說世

界，其中充滿了正義與邪惡的價值對抗，善良人物的苦難遭遇，血淚涕零的感人場景。本書想討論的正是這一敘事傳統的來龍去脈，及其背後蘊含的烏托邦衝動。

在政治學理論中，「革命」須具有嚴格的概念界定，方能進行理論的比較和分析。但在社會實踐中，「革命」的動員、號召、醞釀，卻無不借助於「隱喻」來進行。本書以丁玲的短篇小說〈在醫院中〉的細讀，來討論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思想史中最重要的隱喻之一——「疾病」。社會病理學與社會衛生學的觀念與視景貫穿本世紀社會實踐的各個領域，界定「乾淨」與「不潔」的權力鬥爭也滲透到文學寫作之中。作家們試圖承續魯迅以療救社會疾苦為己任的文學傳統，卻在一朝夢醒之後發覺自己才是必須履踐驅邪祛魔儀式的一羣。「革命」在此時發生的某種倒轉或質變，盡在不言之中。

本書的最後一章其實是最早動筆寫成的。西西的〈肥土鎮灰蘭記〉以一個出人料想的敘述者改寫了著名的「灰蘭記」故事。那個一向被人忽視的小孩子站在灰蘭之中等待命運的判決，突然滔滔不絕地開口說話，質疑包大人的英明偉大，質疑整本戲的編寫與排演。西西的小說，發展出一個將現實焦慮引入傳統故事共同發聲的敘述結構，最終揭示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情節可能只是一個荒謬的解決。同時，對西西作品的討論，也把本書對「革命・歷史・小說」的思考，引至我個人所身處的此時此地。那麼，這本書所討論的種種，便也可能只是「灰蘭」中發出的微弱的聲音罷了。

第一章

「革命」的經典化與再浪漫化

一 經典化與「重大題材」

「革命歷史小說」，在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史中並無統一的稱謂。較簡潔的，叫「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或「革命鬥爭歷史題材」小說。詳細點的，曰「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鬥爭歷史」的小說。有的則將專寫戰爭的另歸一類，稱為「反映革命武裝鬥爭歷史」的小說，或簡單叫作「軍事題材」小說。儘管稱謂不一，從六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的十來部當代文學史教科書，其所論述的作品羣卻都大致相同，正好證明了這些作品業已「正典化」（canonized）了。^[1]

成文的當代文學史在處理紛繁的當代作品時，依例將之從時間上分期（比如：「十七年」、「文革」和「新時期」）、文體上分類（比如：詩歌、散文、小說，小說又分長、中、短篇）、以及依重要作家作品分章。這種敘事方式的知識來源和運作邏輯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此處不作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

1 這些作品通常包括：《保衛延安》（杜鵬程，1954）、《紅日》（吳強，1957）、《紅旗譜》（梁斌，1957）、《青春之歌》（楊沫，1958）、《林海雪原》（曲波，1957）、《紅岩》（羅廣斌、楊益言，1961）。一些可稱為「次典」的作品則有：《三家巷》（歐陽山）、《苦菜花》（馮德英）、《野火春風鬥古城》（李英儒）、《戰鬥的青春》（雪克）、《鐵道游擊隊》（知俠）、《烈火金鋼》（劉流）、《敵後武工隊》（馮志）、《小城春秋》（高雲覽）等。

「小說」門中，又往往進一步依「題材」劃分，其中赫然並列的，往往有「革命鬥爭歷史題材」、「工業題材」和「農村題材」三類。每每又必定提到「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成就較高，「農村題材」次之，「工業題材」的小說儘管乏善可陳，仍取得一定成果云云。這種分類法和評價，似已成定論，甚至一再為八十年代以來新撰的當代文學史沿用。^[2]「題材」的這種劃分方式，初看頗有幾分蹊蹺，其實大有道理。文學生產納入國有化計劃經濟，也不一定刻板地依照「國防工業部」、「工業部」、「農業部」的領導機制來操作，其間必定有更複雜深刻的緣由存在。

「文革」中江青等人制定的文藝綱領，《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批判「文藝黑線」的文藝「黑八論」。「黑八論」中，其中有三論即與本文論及的小說有關。一曰「反火藥味論」，此論其意甚明，無須多作解釋。二曰「離經叛道論」，即離「革命經」，叛「戰爭道」是也。三曰「反題材決定論」，意謂文藝作品的優劣並不由其所寫「題材」決定，而由對各種「題材」的處理是否成功而定。此最後一論看似平平無奇，依了黨的眼光來判定，其要害，乃是煽動作家不寫或少寫黨所認定的「重大題材」，其險惡用心，是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風花雪月」爭一席之地。在當代文學史中，「題材」決非一客觀自然存在的創作材料或素材，而是業已經由當代文化—權力結構劃定、構建的具有等差級別的言說範圍。「題材」問題成為當代大陸文學界一再爭拗不休的「重大」理論（？）課題，良有以也。

2 如以陳荒煤為顧問，郭志剛、董健等編寫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1981，人民文學出版社）、以馮牧為顧問，王慶生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當代文學》（1982，上海文藝出版社）等。